



当代中国经济

DANGDAI ZHONGGUO JINGJI

主 编 王丁宏

副主编 曹 瑾 党 婕 石贵琴



东北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当代中国经济

主 编 王丁宏

副主编 曹 瑾 党 婕 石贵琴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 阳 ·

© 王丁宏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经济 / 王丁宏主编. — 沈阳 :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517-1665-9

I. ①当… II. ①王…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概况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9011 号

出 版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号巷 11 号

邮编: 110819

电话: 024-83683655(总编室) 83687331(营销部)

传真: 024-83687332(总编室) 83680180(营销部)

网址: <http://www.neupress.com>

E-mail: neuph@neupress.com

印 刷 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发 行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85mm × 260mm

印 张: 17.75

字 数: 41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组稿编辑: 曹 明

责任编辑: 梁 洁 潘佳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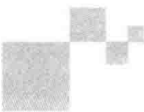
责任校对: 辛 思

封面设计: 潘正一

责任出版: 唐敏志

ISBN 978-7-5517-1665-9

定 价: 55.00 元



序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回顾总结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与经验，这些成就与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基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新特征、面临新问题的正确把握和客观认识，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新设计、新部署，做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判断和改革设计，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入结构优化、质量提升、绿色与包容发展的新的阶段。对如此重大问题的梳理、归纳、总结的思想冲动和现实需求不断撩拨着我们的神经，也提供着强大的动力。与此同时，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本科学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系统性认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一样催人奋进。我们这个团队是长期为工商管理 and 经济类本科专业学生教授理论经济和应用经济课程的核心成员，在长期的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大家对涉及中国经济问题的几乎各个领域都有专门的授课和研究经历，这是《当代中国经济》这部教材编写与出版的主观条件。

在长期的经济学科教学中，我们认为，理论经济学专业本科学生需必修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由于学科特点和属性所限，重点围绕基本经济制度和与经济制度相联系的经济体制来安排教学内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系统性认识及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决策和新部署的理解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样就急需开设一门专业必修或专业选修课来弥补这一缺憾。由于大多数院校的课程设置中没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经济学科部门化，如开设产业经济学、农村经济学、金融学、对外贸易、区域经济学等课程，同样不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大学本科教育中经济和商科学生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总体情况缺乏系统性的认识，也自然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深化改革举措缺乏理性思维，对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现象和问题不能结合中国特殊国情进行理性分析与思考。其他专业的学生，其实也非常想参与到当代中国经济这个课题的学习和讨论中并拥有话语权。

当代中国经济这个课题，涉及的领域和版块很多，内容庞杂，教材体系各不相同。在长期理论经济学教学中，我们总结出十大重要领域，且按照学生的思维习惯构建了描述问题的基本逻辑。这十大领域，一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概述。讲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和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新思维、新布局。二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讲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重点针对“三农”问题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农业现代化等议题展开叙述。三是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革划分成三大阶段：放权让利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重组阶段、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阶段。四是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调整。对比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产业政策的特点和演进规律,对中国产业结构未来调整和演化趋势进行分析。五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把财政和税收放在一起分析,有利于学生整体把握我国财税体制演变历程,重点理解分税制改革、营改增等财税改革节点性制度变革。六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股票市场的发展。金融制度设计是一个更为专业的话题,把金融体制与我国股票市场变革联系放在一起,有利于让非金融专业学生从中国股市这一敏感话题入手,参与到对金融制度变革的理解上来。七是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本来是两个大的课题,但二者确实是有关联的,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变革,内容极为丰富,也有很强的专业性。我们尝试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保障体制设计与演变,目的是让初学者先理解本质性问题,再视学习兴趣向更深层面展开。八是中国对外贸易。这个议题的重点是讲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沿革、贸易结构问题和贸易贡献问题。同时分析上述变化背后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九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本议题重点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特征。对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运行几次大的波动给予理论上的分析与说明,并对政府宏观调控思维与实践进行了解析。十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区域性不平衡特征的表现与原因,对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进行一个全景式展现,并重点解析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新思维。

在对上述问题阐述的逻辑安排上,我们领会并运用了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中的一种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历史的顺序,也正符合由简单到复杂的人的思维逻辑的顺序。我们就上面十个问题设计了十讲内容,每一讲的内容编排都遵循上述方法,由历史叙述开始,到现实和趋势分析结尾,高潮往往发生于对改革开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的全景式展示上。

团队的七位专业教师分别承担如下工作。

- 第一讲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概述 王丁宏
 - 第二讲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 王丁宏
 - 第三讲 国有企业改革 王丁宏
 - 第四讲 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调整 曹瑾
 - 第五讲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 曹瑾
 - 第六讲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股票市场的发展 石贵琴
 - 第七讲 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孙文婷
 - 第八讲 中国对外贸易 党婕
 - 第九讲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 张怀林
 - 第十讲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唐志强
- 全书由王丁宏统稿。

本教材编写和出版得到甘肃省河西学院自编教材立项资助。感谢河西学院教务处、河西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对本教材编写的大力支持。

编者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目录



第一讲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概述	1
一、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1
二、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与总结	8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4
第二讲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	30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	30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	34
第三讲 国有企业改革	50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国有企业制度（1950—1977 年）	50
二、撬动计划经济坚冰——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1978—1993 年）	56
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战略重组（1993—2002 年）	67
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2003 年至今）	80
第四讲 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调整	91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	91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产业政策	100
三、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与重点	112
第五讲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	119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财税体制	119
二、1994 年税改前的中国财税体制	123
三、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及其完善	129
四、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趋势	144
第六讲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股票市场的发展	148
一、改革开放前的金融体制——“大一统”的金融体制（1949—1977 年）	148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体制的多样化与股票市场的起步（1978—1992 年） ...	152

三、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银行体制改革与股票市场扩容（1993—2001 年） 159

四、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及股票市场的市场化改革（2001 年至今） 168

第七讲 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176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概述 176

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 182

三、十八大以来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 192

第八讲 中国对外贸易 199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概述 199

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06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思维和新格局 211

第九讲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 222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回顾 222

二、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 228

三、宏观调控新思路：走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长期均衡增长 242

第十讲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252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格局 253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演变 257

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思维和新战略 271

第一讲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概述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的出现源于改革的红利、人口的红利、全球化的红利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市场化取向，市场化改革成功地刺激和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的高效投入和成为“三驾马车”的需求对经济增长强有力的拉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和位居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也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经济发展是非均衡的，增长模式是非集约型的。进入 21 世纪后，经济结构调整、公平发展与包容性发展、诸多深水区改革都逐步展开，特别是在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社会管理、教育、科技等体制逐步展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20%。但经济发展中也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约束加重、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分配不公、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社会发展短腿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换挡减速阶段，重在结构调整、提高质量、提升创新能力的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适应新常态和国民经济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

一、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

截至 1949 年，中国仍然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有以下三个特点。① 经济水平发展较低。传统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总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与同年的苏、美两国相比较，中国近代工业不仅落后，而且彼此不相配套，煤用不完，电力匮乏，生铁只有 1/2 能炼成钢，而轧钢能力仅仅及炼钢能力的 1/2。这些都反映出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落后地位，对国外很多产品有较强的依赖性。例如，洋车、洋火、洋碱都是对外国产品的称呼。② 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据统计，1943 年东北生铁、钢铁、煤、电力、水泥产量分别占全国产量的 87.7%，93%，49.5%，78.2%，66%，这就为以后东北成为老工业基地打下了重要基础。但这种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影响政府经济决策的重要因素，对经济决策的施行产生了很大的阻力。③ 长期的战乱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仅以 1949 年与 1936 年相比，农业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竟减产 26% 之多，1949 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仅为 237.5 千克原粮，大多数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自新中国成立到 1952 年，经过三年的恢复，全国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在农业方面，全国农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近一半，按照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已经达到 484 亿元，农村经济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工业方面，工业生产增长很快，1952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349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了 1.5 倍。

1952—1956 年，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国工作重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1956—1978 年，改革开放前这个时期的经济大起大落。由于片面追求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实行粗放式扩大再生产，忽略了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质量很差。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工业——按照净产值计算的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7—1978 年平均增长 3.4%。其中，独立核算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 2.6%。1966—1978 年，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 1.5%。

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的紧缺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导致国民经济的另一重要部门——农业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按照净产值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1978 年仅为 1957 年的 94.8%，年均每年下降 0.2%。

由于从 1953 年起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给重工业建设筹集资金，国家实行以牺牲当前消费为手段的高积累政策，再加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1957—1978 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名义工资由 637 元增加到 644 元，仅增加 7 元。就实际工资而言，1978 年仅为 1957 年的 85.2%，22 年间减少了 14.8%。这 22 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徘徊、停滞状态。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新时期。30 多年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锐意推进改革，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活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二）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大转变和大跨越，基本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双重过渡。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经济转换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元结构转换效应和经济体制转轨效应促使中国经济的综合效率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中国式综合效率提高驱动型的特征。在综合效率提高驱动下，我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持续提高，创造了“中国奇迹”。

1. 经济发展大跨越，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巨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的 30 多年，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的 30 多年，也是成功地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跨越的 30 多年。

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速高达 9.8%。1979—201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 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 2.8%。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

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3645 亿元迅速跃升至 2012 年的 518942 亿元。其中，从 1978 年的 3645 亿元上升到 1986 年的 1 万亿元用了 8 年时间，上升到 1991 年的 2 万亿元用了 5 年时间；此后 10 年，平均每年上升近 1 万亿元，2001 年超过 10 万亿元大关；2002—2006 年平均每年上升 2 万亿元，2006 年超过 20 万亿元；之后每两年上升 10 万亿元，2012 年已经达到近 52 万亿元。

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1978 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 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 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 1978 年的 1.8% 提高到 2012 年的 11.5%。自 2008 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08—2012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 2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成功地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1978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 381 元，1987 年达到 1112 元，1992 年达到 2311 元，2003 年超过万元大关（至 10542 元），2007 年突破 2 万元（至 20169 元），2010 年再次突破 3 万元大关（至 30015 元），2012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8420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 1978 年增长 16.2 倍，年均增长 8.7%。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同步实现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 1978 年的 190 美元上升至 2012 年的 568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确实难能可贵。

国家财政实力明显增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能力日益增强。1978 年国家财政收入仅 1132 亿元；1985 年翻了近一番，达到 2005 亿元；1993 年再翻一番，达到 4349 亿元；1999 年跨上 1 万亿元台阶，达到 11444 亿元；2007 年超过 5 万亿元，达到 51322 亿元；2011 年再次超过 10 万亿元；2012 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 117254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103 倍，年均增长 14.6%。财力的增加对我国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社会保障、减小城乡差距、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类冲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实现从外汇短缺国到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的巨大转变。1978 年，我国外汇储备仅 1.67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 38 位，人均只有 0.17 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足 1 元钱。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壮大，经常项目贸易盈余不断积累，外汇储备的短缺成为历史。1990 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 111 亿美元；1996 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 1050 亿美元；2006 年超过 1 万亿美元，达到 10663 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11 年超过 3 万亿美元；2012 年达到 33116 亿美元，连续七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2. 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趋于增强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30多年来，三次产业在调整中均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1979—2012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分别增长4.6%，11.3%，10.8%。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2年的10.1:45.3:44.6。与1978年相比，2012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18.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2.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20.7个百分点。

需求结构明显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小，基础设施落后，对外开放程度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波动较大，需求结构很不稳定。1981年甚至出现了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3%的局面，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经常为负值。但随着经济实力提高、融资方式多样化、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幅提高，2007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9.6%，42.4%，18.0%。近年来，在国家扩大内需战略带动下，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内需的强劲增长有效地弥补了外需的不足，对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2012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5.0%，47.1%，-2.1%。

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按照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2000年，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1985年上升了8.3个百分点，西部仅上升了0.4个百分点，中部和东北则分别下降了4.2个百分点和4.5个百分点。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府相继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决策。特别是近年来，区域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步伐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不断释放，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2012年，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5%，24.1%，11.1%；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6.0，5.0，2.7个百分点。

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6%，上升了34.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0个百分点。城镇总人口年均增加1586万人，乡村总人口年均减少435万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并不断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23.7%上升到2012年的48.4%，乡村就业人员占比从76.3%下降51.6%。

（三）问题透视：“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的反思

1. 准确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

“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中国模式”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的模式

“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模式是体制层面的东西，它体现制度的属性。脱离社会主义制度谈“中国模式”是不科学的，“中国模式”的成功正是在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中国模式”坚持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

（2）“中国模式”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

实践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但不能跨越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前已经病入膏肓。国家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部门管理机制、以行政手段来调节经济运行的方法，都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绝境。

（3）“中国模式”是坚持和平发展的模式

和平发展是“中国模式”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中国的发展既不走苏联对外扩张、霸权主义的道路；也不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掠夺和殖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控制别国的道路；我们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既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又消解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担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2. “中国模式”造就“中国奇迹”

“中国模式”的最大作用在于它提供了另一条发展途径——而且有可能在于提供了一种迂回的前进路线，从而绕过当前源自西方的经济问题。实现跨越式发展，造就了“中国奇迹”。它的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模式”表明，一国的发展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

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指的是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由落后到先进、由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中国的发展既没有采用“苏联模式”，也不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实行“全盘西化”。我们的发展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我国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逐步、渐次地推进改革，总体上保持了社会的有序、稳定。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性不同，因此，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以本国的国情为出发点，盲目照搬他国的经验只会落入“现代化的陷阱”。苏联改革的失败和拉美的经济倒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不能迷信他国的经验和发展模式，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由此表明，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采用一种模式解决。中国有自己的模式。

(2) “中国模式”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

从发展的角度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模式;从制度的角度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始终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模式”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的条件下探索、总结并发展起来的,它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进程,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重要发展目标。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共同的现代化课题。既然如此,中国的发展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市场经济体制、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渐进式的改革等,这些都是积极地回应了全球化和反思现代化过程中的成果,具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中国模式”本身还不成熟,还处在不断的建构过程中,还将面临国内国际的众多挑战。“中国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既有待实践的检验,也有待自身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坎彭斯的话:“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因此可以说,是“中国模式”造就了“中国奇迹”。

再次,中国模式能否可持续。中国30多年“经济增长奇迹”是转型发展导致的结果,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取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30多年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是高增长、不稳定,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地区和城乡差距拉大、失业等社会问题。而且在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中,遇到了技术约束、资源环境约束、能源约束。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重视解决以下问题。

① 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促进经济增长由规模扩张型向效率提高型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在发动经济增长的初期一般都追求“快”,实施赶超战略,中国在经济转型需求推动下实现的30年增长的奇迹实际上也是赶超战略的结果。从增长方式来看,仍然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在一定阶段的成功得益于发展初期的环境,如工业化的总体水平低、市场竞争不激烈、环境和资源约束较为宽松。随着工业化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片面追求“快”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必然要走到尽头。我国经济要实现长期较快发展,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得以持续,就必须从主要依靠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实现经济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保证,推动自主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摆脱技术依赖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

②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持续3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使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单纯追求GDP,客观上忽视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出现了城乡差距拉大、区域经济差距严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等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现代化的两种重要动力机制,尽管它们各自履行的功能不同,一个主要涉及发展的速

度，一个主要涉及发展的稳定。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可持续性，必须依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上，追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协同，通过社会有序发展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保证。

③ 以和谐发展统领。实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中国30多年的改革，在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社会利益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利益冲突源于利益矛盾，而利益矛盾又源于利益差异。这样，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程度不同的矛盾便广泛地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利益主体、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制度的缺失，形成了一些利益矛盾，在此基础上，就有可能引起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持续。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就必须以和谐发展统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完善利益调节、利益协调和利益补偿机制，实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

④ 以“富民”为目标，使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经济增长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经济增长的终极关怀是实现人的发展，无论是增长，还是改革，都应当考虑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使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也是实现“中国奇迹”长期持续性的一个关键因素。为此，需要以“富民”为目标，谋求人民富裕。这不仅涉及加快经济增长问题，还涉及经济增长成果如何分配，才能使人民群众得到最大收益、最大的社会福利问题。即要以“富民”为目标，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快是指速度，好是指质量，使经济增长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



延伸阅读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通常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针对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所提出并形成的一套政策主张。1989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将它归结为“华盛顿共识”，共包括10条改革建议，其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政策稳定化。这10条改革建议是：1. 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 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 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 实施利率市场化；5. 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 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 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 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 放松政府的管制；10. 保护私人财产权。

“北京共识”是国际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来的。这一新概念与此前国际媒体热炒的“中国模式”一起，拉开了对中国发展道路与成功经验全面审视的新主题。“北京共识”吸引世人眼球，被不断地热烈讨论，在日益成熟和完善中，人们看待“北京共识”越来越理性。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北京共识”的核心就是一个国家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对于中国如何组织这样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三个定理：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

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他认为：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由雷默阐释的“北京共识”可以概括为：以社会主义为取向、以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人本务实为理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换言之，“北京共识”就是高扬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通过改革创新，推动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资料来源：于桂华，姚冬萍．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选择：兼论“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J]．中国总会计师，2008（8）：68-69.）

思考与讨论：

- ① “中国奇迹”出现的原因分析。
- ② 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二、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与总结

在 1978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此为标志，掀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中国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过去的这 30 多年，按照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历程，可以划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的启动与逐步展开阶段（1978—1992 年）。这一阶段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从 1978—1984 年的展开启动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国，虽然也存在少量的市场调节，但总体上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体制转轨这个角度来分析，就是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在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在农村。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为标志，在整个农村掀起了农村体制改革的浪潮，也就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到 1983 年年底，全国包产到户的覆盖面达到 95%。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里的工商企业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即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二是改革的展开阶段（1984—1992 年）。在 1984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当然，由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不够鲜明，因此，在后来的实践中，就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执行方案。有的人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它的落脚点是商品经济，应该按照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规律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也有人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前提是有计划，应该按照有计划的思路来推进改革。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报告，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但此时市场的色彩更加浓重一些。

第二阶段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1992—2002年）。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针对长期以来流行的“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观念，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是带有突破意义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推动下，1992年10月12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11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对于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来进行改革作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即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改革、农村改革、对外开放和科技体制改革。此外，还有法制建设。这八个方面可以归纳为“八柱”，支撑着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厦。

这一阶段持续了10年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和进入新世纪后的前两年。在这一阶段，应该说改革的力度比较大，向纵深发展的势头也比较强劲。尤其是中共十五大之后，在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有一些明显的进展。

第三阶段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2002—2012年）。2002年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下一步主要是如何完善的问题。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了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定型。这一阶段围绕新的改革重点，开始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注重加大财政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力度。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中国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和道路是不是正确？二是对前一段改革的功绩和成效怎么评估？三是下一步改革怎么做，是停顿、倒退，还是进一步地向纵深发展？针对这些争议，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作出了明确指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是对中国改革30年多年历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进展和成效

1. 所有制结构改革

所有制结构改革属于微观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微观领域着手进行的。在微观这个层面上，双线推进：一条线是国有经济领域的改革；另一条线是非公

有制经济的培育和发展。

① 国有经济领域的改革。1984 年公布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地指出了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就紧紧地抓这个中心环节，重点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点”上的改革，也就是推进国有企业这个细胞层面的改革，主要方向是实行产权关系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面”上的改革，就是推进国有经济整体布局和结构的调整与重组，主要方向是有进有退，优化格局。三是“线”上的改革，也就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方向是完善出资人监管，同时确保政资分开。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有经济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调查和分析，大体上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面，在 50% 左右。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国家重点企业中的 2524 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看，2005 年年底已有 1331 家改制为多元股东的股份制企业，改制面为 52.7%；中型企业估计在 60% 左右；至于小型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县以下的部分，改制面估计达到 90% 左右。基本上可以说，中、小型的国有企业第一轮的改革已经进行，企业层面的改革有了相当大的进展。

② 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可以从三项指标来看“非国有”经济的成长。一是工业指标。1978 年，非国有制经济（主要是集体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 22.4%；而在 2006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 64.4%。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指标。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从改革开放之初（1980 年）的 18.1% 提高到 2006 年的 59.3%，上升了 41.2 个百分点。三是就业指标。城镇中各种非国有单位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1.7% 提高到 2006 年的 77.3%，上升了 55.6 个百分点。这是从纵向来看。

从横向看，改革开放至今，各种指标的所有制结构如何，也就是看国有所占的比重及非国有所占的比重。从工业增加值看，国有占 35.6%，非国有占 64.4%。从固定资产投资看，国有占 40.7%，非国有占 59.3%。从就业看，国有占 22.7%，非国有占 77.3%。

2. 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

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支柱，既包括商品市场体系，也包括要素市场体系。商品市场体系包括工业品、农产品及劳务等，要素市场体系包括土地、劳动力及资本市场和各种各样的资源市场等。

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在商品市场建设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截至 2006 年年底，在商品零售环节，市场调节价的比重达到 95.3%，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比重只有 4.7%。在农副产品收购环节，市场调节价的比重达到 97.1%，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比重只有 2.9%。在生产资料销售环节，市场调节价的比重达到 92.1%，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比重只有 7.9%。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商品市场，可以说市场发挥着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30 多年来，还发展了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进展也比较明显。